

我国古代符咒风俗考述

段塔丽

(陕西师范大学 古籍所, 陕西 西安 710062)

摘要: 符咒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巫术。经过道教的吸收和加工改造,成为道教法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随着道教的广泛传播,符咒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习俗文化,并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,深刻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。然而,这种文化的根柢,乃是古人世界观、人生观的一种反映。

关键词: 古代中国; 符咒; 巫术; 习俗文化

中图分类号: K89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293(1999)03-0047-05

我国古代的符咒,作为一种习俗文化和民间信仰,自形成以来,上自帝王将相,下至黎民百姓,对它的虔诚与信奉,几乎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以致于它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,乃至日常行为规范,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直到今天,在一些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,仍可见到这一习俗的遗留。因此,搞清这一习俗的起源、流变及其功能和意义,对于移风易俗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我国古代民间信仰中的符咒,就其内容来看,乃是“符箓”与“禁咒”或“咒语”的结合物。“符箓”,也称之为“符”、“符文”、“神符”或“道符”。指的是道士用以驱鬼治病的秘密文书。其中屈曲作篆籀及星、雷之文者,称为“符”;记载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者称为“箓”。后因“符”与“箓”在召神劾鬼方面的功用一致,人们遂将两者并称。在我国古代,符箓、经戒、服饵及房中术被称为道士的四种法宝。

“咒”,又称为“禁咒”、“咒语”或“咒术”,是指术士或道士驱鬼治病时诵念的某种特殊语言或口诀。与符箓不同的是,咒术作为人类社会初期共存的一种巫术文化现象,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生和流行过。如古代印度人为了治愈黄疸病,根据顺势巫术的原则,将黄颜色从病人身上转移到黄色牲畜或别的东西上,而将象征健康的红颜色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红公牛身上转给病人。为达到这一目的,便是通过巫师念咒的办法得以实现。^[1]又比如,古代塞内冈比亚的非洛普人为使天神在旱灾之年降雨,方法便是推倒他们的崇拜物并拖着它们在田地周围边走边诅咒,直至下雨为止。^[1]中国也不例外,只是中国的咒术更别具特色。例如祈雨活动,往往用纸或木头或泥土做成一条巨龙象征雨神,并列队带上它周游各处,若假龙没有“显灵”,

收稿日期: 1998-09-15

作者简介: 段塔丽(1962-),女,河南平舆人,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,史学博士。

便会受到诅咒或被撕碎。另一方面,古代中国的咒术,常与符箓相配合而起作用,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未见。至于咒语本身,往往为韵文或散文体,它是我国民间文学中四言歌谣、五、七言歌谣或民间赋体的转化形态[2],这是我国古代咒术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地方。

稽考史籍,有关“符咒”的起源相当早。先来看“符”。“符”(道符),作为道士使用的神秘图形与文字,在文献记载中,又作“符文”、“符书”、“符术”、“符图”和“符箓”等,名虽不同,实指一物。“符箓”的起源,据北宋高承《事物纪原·符箓》引《龙鱼河图》记载:“天遣玄女,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。黄帝出车诀曰:‘蚩尤无道!’帝讨之,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。帝悟,立坛而请,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,置之坛中。盖自是始传符箓。”按《龙鱼河图》,系一部谶书,谶书盛行于两汉之际,以专意伪造天命预言为能事。正如东汉桓谭《新论》中所说:“谶出河图洛书,但有兆征而不可知。”又谶书与神仙方士之说相近,汉末合流。故《龙鱼河图》当是谶言与神仙方士之说合流后的产物。[3]因此,书中所言符箓的由来,自然不足为信。然而,符箓究竟起源于何时呢?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笔者以为,符箓既然是由一定的图形与文字所构成,追根究底,当与上古时代甲骨文、金文、籀篆文等古文字有一定关系。目前国内有关学者考证认为,符箓的形成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、上古天命符瑞思想,以及汉代文书印章。[3]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。从中可以发现“符箓”历史之悠久。按“符”字,从竹,本义为“符节”,一种凭信之物,古时曾用作出入关门的凭证。《周礼·地官·掌节》中有“门关用符节”的记载,《孙子·九地》又言“夷关折符,无通其使”,说明当时将写有籀篆文字的竹、木片或金属片用作旅行者的证件称之为“符节”。其形有“铜虎符”、“玉圭符”、“龟符”和“鱼符”等。这种用作进出关门凭信的符节,在我国古代也常用于朝廷与将帅之间,作为委任和调兵遣将的信物。这种用作出入关门凭证的“符节”,到了战国秦汉之际,随着“阴阳五行”、“五德终始”说,以及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,“符”便由单纯作为信物或凭证的职能,逐渐演变为抽象意义上的人与天、地之间的“符应”和“感应”了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记载了战国时代齐国阴阳家学派代表人邹衍的言论时说:“称引天地剖判以来,五德转移,治各有宜,而符应若兹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五德”,即“五行”,也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;所说的“符应”,即上天所降的祥瑞与人事的感应或契合。又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也载:“天瑞下,宜立祠上帝,以合符应。”可见这里的“符应”或作“符命”,显然是由符节、符信进一步引申而来的。而符命是上天赋予君主的使命,常以符箓、祥瑞的形式出现,信而有征,如同符节一般可以契合、验证。道教产生以后,道士用作驱鬼工具的“道符”,即由先秦以来“符节”、“符应”和“符命”之符发展演变而来,只是内容与涵义略有变化而已。它指的是道士通过与上天沟通,以合上天意志,因而具有无穷法力。另一方面,道符之符,因秉承天神上帝旨意而特别“灵验”,如同符契一样信而有征。这正如道教要籍《云笈七签·十二部义》中所说:“符以符契为名,谓此灵迹神用无方,利益众生,信若符契。”至于符箓的文化功能,台湾学者李叔还对此有过简明扼要的解释:“符箓,道家秘文也。……符箓可谓通天神,遣地祇,镇妖驱邪,故道家受道,必先受符箓。”[4]

再看“咒”。最初的“咒”,写作“呪”,或作“祝”,从儿从口,像巫师或祭祀者膝地而跪向天祈祷之状。故对天或神明祷告便成了“咒”的最初含义。查考典籍,最早的咒,几乎都是祝词,而且大都以延年益寿为内容。如《庄子·天地》:“请祝圣人,使圣人寿。”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:“今巫祝之祝人曰:‘使若千秋万岁!’又《论语·述而》中也记载说,孔子患病,弟子子路为其祈祷神祇,令孔子延寿。此外,甲骨文中有不少卜辞也都是有关祈求祖先神灵、赐福保佑子孙的内容。古

代巫师(或巫祝)在念咒作祷告时,为使其咒词或咒语更能奏效,于是便在念咒时加入了一定的仪式和法术,由此形成了咒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最初表示善意的祝(咒)逐渐被表达恶意的“诅咒”之咒所取代。但祝(咒)的正面祈祷之意并未完全消失,仍保留在后世咒语中。如《后汉书·凉辅传》载:“时夏大旱,……连日而无所降,辅乃自暴(曝)庭中,慷慨呪(咒)曰:‘辅为股肱,……敢自祈请。’”此处的“呪”,即“祝”的原意,但也包含了祝的后起之意,即“诅盟”、“诅咒”之意。

咒术发展到后来,内容由单纯祈求延年益寿逐渐向祈福禳灾、拔除不祥,以及镇妖除怪等多功能多元化发展。“符篆”亦不例外,与咒术相比,符篆之术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和魅力。首先它不仅全面吸收了先秦以来多种巫术和迷信,诸如青铜纹饰祈福引魂之功效,傩舞礼俗中驱鬼逐疫之法术,以及符命、符瑞、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等。而且具备了“以祛邪伪,辅助正真,召会群灵,制御生民,……安镇五方”的多种功能,这恐怕是符篆之术自汉末道教产生后,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直至封建社会末期,而长盛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二

符篆与咒术,作为古代民间信仰中道士驱鬼逐疫时常用的法术,形式虽不同,但目的和功用却基本一致,都是用来召神劾鬼、消灾免祸和驱妖镇邪。正因如此,两者逐渐合而为一,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巫术之一。

符与咒,二者何时合流,目前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尚很缺乏,难以稽考清楚。至于说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符咒风俗与文化,则大致可以推断早在道教形成以前的两汉之际就已存在,此后,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而广为流传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宗教信仰史上,将中国人固有的思想、信仰和信条建立起体系的是道教。道教不仅包融了中国文化的多种成分,而且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、文化、宗教、哲学和迷信信仰等各个方面。因此,道教自东汉末年创立之后,符咒这一民间信仰和文化便很快被道教所吸收,经过一番加工和改作,成为道士们呵禁鬼神、祛妖除怪的重要法宝。据《后汉书·刘焉传》记载:“〔张〕鲁,字公旗。初,祖父陵,顺帝时客蜀,学道鹤鸣山中,造作符书,以惑百姓。”又《汉天师世家》也载:“张道陵天师,教民信奉黄老之道,常以符咒治病。有病者使饮符水即愈,著有效验,从者甚众。”又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云:“时有道士琅玕于吉,……制作符水以治病,吴会人多事之。”按:于吉与张道陵差不多同时在东汉顺帝时得道,两人所作道符,或用符水为人治病,以便争取民众,乃是基于符咒信仰在此以前已在广大民众心理拥有一定影响。另据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注引《典略》云:“太平道者,师持九节杖为符祝(咒),教病人叩头思过,因以符水饮之。”这种道教符祝之所以被民众普遍接受,一则因为它与战国秦汉以来所宣扬的“天降符命与人事相应”的思想有密切关系,另一方面,也与符水(道家用以治病的所谓“神水”)和中草药让病人饮服后,有某些疗效有关。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载:“〔张角〕奉事黄老道,蓄养弟子,跪拜首过,符水呪(咒)说以疗病。”又沈约《宋书·羊欣传》也载:“〔欣〕素好黄老,常手自书章,有病不服药,饮符水而已。”可见从东汉迄南北朝,道士用符水治病,已逐渐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推广。

三

民间信仰中道家所用的驱鬼禳灾的符咒,之所以能广为传播,其原因就在于道教这一中国

土生土长的宗教,很善于抓住广大民众的心理,赋予符咒之术以神秘性、实用性,令人深信不疑。关于这一点,可以从《太平广记》这部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中找到不少例证,如此书卷453《李自良》条引《河东记》中的故事说,有一狐化为道士,手持两张文书站在棺木上,李氏乘其不备,夺得文书,发现“其字皆古篆,人莫之识。”同书卷448《杨伯成》条引《广异记》,说唐杨伯成家闹“狐魅”,驱之不得,请道士来驱魅,只见道士“书作三字,状如古篆”。这里道士有意将所书之“符”神秘化,令人“莫之识”,乃是抓住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,广大民众普遍愚昧无知,对上古文字,特别是对用篆文所写的官方文书不识(视为天书)、恐惧而崇拜的心理,借此达到震慑鬼神的目的。如《太平广记》卷448《叶法善》条引《纪闻》说,唐开元初,某名族之子族任职江南,正打算乘船赴任之际,忽有老狐化为胡僧,“执幡花前导”,此人亲属皆为所惑而离家出走。此人呼之不应,于是请道士叶法善驱鬼。叶道士书符后,令人将符置于名族家门上,不久,受惑诸人渐渐从恍惚中省悟过来。而化为胡僧的老狐,也在叶道士的符禁下现了原形。同书卷450《王苞》条引《广异记》也说,吴郡人王苞为太学生时,曾被野狐所化女子诱惑而不能自拔,道士叶静能察觉出王苞身上有“野狐气”,于是“书一符”给苞,王苞按照叶道士的指点,将所书符吐入女子口中,片刻间,女子“遂变为老狐”。道士所书之符有这样的“魔力”,难怪古代民间对它这样迷信和崇拜了。

伴随着道教的广泛传播,符篆之术,经魏晋南北朝而大盛。据《魏书·显祖纪》载:“〔天安元年〕辛亥,帝幸道坛,亲授符篆。”皇帝亲授符篆,黎民百姓自然相与仿效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所著录的符篆共有17部,计103卷。据此可知,整个南北朝迄于隋朝,符篆之术在当时社会上已风行一时。入唐以后,由于李唐统治者大力扶持道教,符篆之术更加流行,且遍及社会生活各个角落。当时受符篆者不可胜数。据有关文献记载,唐高宗时,仅两京(长安和洛阳)受道箓(即符箓)者,“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余人”[5]。两京情况如此,至于全国其他地方,特别是民间受道箓的人数,恐怕就更为可观了。唐末五代以后,道教斋醮活动十分兴盛,宫中设醮,史不绝书。而画符念咒作为斋醮仪式中的主要仪注,成为每次斋醮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。明代以后,尽管道教衰微,但民间斋醮活动仍很流行。这从明、清之际几乎所有章回小说的开场白中都有道符出场,就可说明问题。

四

我国民间除了对道符的神效十分崇拜外,对咒语的“魔力”,同样深信不疑。这不仅是因为它操作简便(只需口头念念有词),而且据说相当“灵验”。在古人看来,只要知道了某些鬼魅妖物的禁忌和弱点,就可以凭借咒语,降魔除怪。如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中说:“余闻古之治病,惟其移精变气,可祝由而已。”注云:“由,从也,言通祝于神明,不劳鍼石,病从而可愈也。”可知咒术在古代常用于治病。此外,咒术在古代还用于驱除瘟疫仪式中。《续汉书·礼仪志》中记载了当时举行大雩仪式时所念的一段咒文。咒文中说:“……凡使十二神追恶凶,赫汝躯,拉汝干,节解汝肉,抽汝肺肠,汝不急去,后者为粮!”又《太平经》卷50《神祝文第七十五》载:“天上有神圣要语,时下授人以言,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。人民得之,谓为‘神祝’。”意思是说这些咒语,乃神灵秘密授予人,其中包含了神吏的力量和作用。当时的人们由于缺医少药,十分迷信咒语神通广大,以致于将“咒语”治病,视为“灵丹妙药”。道教正是利用了人们这一心理,将咒语大量用于道教各种科仪中。如在举行斋醮仪式上要念咒,超度亡灵时要念咒,施行法术、诵经礼忏时也

要念到它。尤其是行法术镇妖除怪时,若不念上几遍咒语,似乎法术就不灵,鬼魅妖怪就除不去。咒语有这般“魔力”,自然古人要对它崇拜和迷信了。

五

古代道士们画符念咒的法术,其目的和功用主要在于镇恶驱邪,祛病延寿和祓除不祥。其实用性和多用性,一方面表明它适应了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各种需要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,往往幻想通过一定的超自然神力获得某种精神上的释放或解脱。这是民间信仰和迷信行为的思想根基之所在,同时也是宗教神学产生和发展的内部原因之所在。以符咒习俗文化而论,对于不同阶级、不同阶层的人来说,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,故所受符篆、咒术的目的也显示出各自的差异:如有为了祈求仕途顺利、官运亨通而受符咒者;有为了家族兴旺、多子多福而受符咒者;也有为来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稔而受符咒者。道士们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,画出了各种各样、不同类型的符:诸如所谓“保胎符”、“护身符”、“治病符”、“镇宅四角符”,以及“驱鬼辟邪符”等等,真是门类齐全,应有尽有。与此相适应,在我国古代民间传承中,“咒语”的种类同样形式多样,内容各异:诸如所谓消灾治病之咒,水旱虫灾祓除之咒,婚丧嫁娶之咒,召神驱鬼之咒等等[1]。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、名目繁多的符咒习俗文化的表象,不难发现,它与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密切相关;同时也与人们一整套诸如送往迎来、婚丧嫁娶、岁时节庆等人生礼仪息息相通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,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这种符咒风俗,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综上所述,我国古代的符咒习俗和文化,作为早期方术、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古代民俗文化的综合体现,自汉末产生以来,赢得了无数人们的崇拜和信仰。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,它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和价值观念,而且广泛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剥去符咒迷信的外衣,可以看到它的产生,是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,生产力水平不发达,人们认识自然外界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的产物;另一方面,它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,教育被统治者所垄断,广大民众普遍愚昧无知的表现。今天,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达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,这一落后的文化习俗,必将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詹姆斯·乔治·弗雷泽. 金枝[M]. 北京: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7.
- [2] 高国藩. 中国民俗探微[M]. 南京:河海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3] 刘晓明. 中国符咒文化大全[M]. 广州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5.
- [4] 李叔还. 道教大辞典[Z]. 台北:台湾远流图书公司印行社,1983.
- [5] 李昉. 太平广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
[责任编辑 许正文]